

新中国初期“革命外交”影响下的周边观 ——以20世纪50年代初期印外交实践为例

杨哲¹

(1.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 昆明 10691)

摘要: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共产党逐步完成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但受自身革命运动经验、国内政治状况和国际外交形势的影响, 在建国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 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带有强烈的革命色彩, 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特点的“革命外交”观念。这一观念极大的影响了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态度与外交政策, 并奠定了建国初期中国周边观的主要基调。20世纪50年代, 出于国内外多方面的考虑, 中印建交, 并在之后十年里外交关系持续升温, 并度过了一段蜜月期。这段外交关系的变化较为集中地反映了“革命外交”理念下中国的周边观念的特点与实质。

关键词: 革命外交; 中印关系; 周边观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316

引言

“周边”一词通常与“关系”、“外交观”、“区域观”等词连用, 强调一个国家以己为中心看待外部世界, 处理与外部的关系, 并与周边邻国形成的各式外交惯例。而“周边观”指的是一个国家对于其周边邻国在政治、经济、国家性质等多方面的宏观认知和基于此采取的一系列外交政策。中国邻国众多, 在长期的交往中和周边国家建立复杂、多样的关系, 构建起一套以儒家等级秩序思想为指导的“中心-边缘式”架构, 即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周边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周边观发生了改变与拓展。从思维层次上看, 中国领导人开始站在全球战略层面思考亚洲地区问题的; 从范式上看, 革命的传统与阶级斗争思维方式的惯性使得外交观念带有浓烈的革命色彩, 周边观亦是如此。本文将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革命外交理念与受其影响下的周边观, 并以20世纪50年代的中印关系为切入点。

一、革命外交的形成及含义

革命外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最主要的外交思想, 对建国初期的各类外交政策与处事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革命外交的含义主要有两个: 第一为“革命式”的外交, 即将国内革命运动期间使用的阶级斗争方法与统战思维用于外交事物之中, 以“非敌即友”的二分法观念用于处理与国与国之间关系, 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处理外事, 虽也产生过“中间地带”的思想, 但仍是斗争的思维为主; 第二为“革命性”的外交, 即对以革命者的身份对以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为主导的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的合法性提出根本性的挑战。为打破这种旧格局, 早期领导人以国际主义的视野, 对中国周边国家进行了革命援助, “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就是其中的代表。中国的革命外交是基于特定的国情和国际局势产生的, 它的产生和发展更是有着一条清晰的脉络。

早期受革命党立场和革命运动主要集中在国内的影响, 不同于革命观念的较早滥觞, 中共“外交观”的形成相对滞后且与当今意义上的“外交”有较大的不同。在当时的中共看来, 在国与国之间只有弱肉强食和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外交是不存在的, 更习惯于以反帝斗争的思路来理解国家之间的关系, 认为“反革命势力”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差不多都是中国革命的敌人, 当然也是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的扩张是中国的“绝大的

作者简介: 杨哲(2003—),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危险”，美国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英国也没有“比日本好的地方^[1]。”这使得中共对于“无产阶级世界”以外的国家尤其是帝国主义国家抱有很强的排斥心理，对于同这些国家的外交更是少有考虑。

到1930年时，当时的中共开始考虑创立自己的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外交”有了初步的接触与尝试，但非此即彼、与帝国主义势同水火的阶级斗争观念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他们将外交等同于反帝斗争，认为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不仅“绝不（能）有任何‘敦睦邦交’或‘亲善邻国’的意义”而且就是俄国布列斯特和约的经验也“不能在中国运用”。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必须以“充分暴露帝国主义罪恶”为目的，因为任何试图和缓帝国主义进攻的企图，都“必然要阻碍着坚决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1]。”这与之前的“对外观”别无二致，彻底的反帝和拒绝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有任何联系是当时中共的主流思想。

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遭受沉重打击，在极端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裹挟下，法西斯主义趁机在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国兴起，它们开展军备扩张，力图以军事侵略转移国内矛盾，使世界局势日趋紧张。在此情况之下，1935年7月，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苏联和共产国际要求各党联合国内外的一切力量建立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保卫苏联。这种号召引起了中共的重视，于当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报告指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他认为，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1]。”统一战线的提出，使得中共逐渐改变对内、外的认知和政策，开始从斗争中寻找合作。

1936年7月15、16日，毛泽东在陕北保安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指出“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2]。”这一宣言可视为中共“外交”工作开始。但这里的“外交”并非是这从国家角度出发的外事活动，而是立足于党政角度，更多地指“党和非党之间，或党与党外势力之间联络交涉的工作”国内的国民党和英、美、苏等国与日本人民及士兵都是“外交”的对象，但前者通常为主要对象，这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将“统战”和“外交”两个概念混用的情况。1944年美国军事观察团赴延安考察，中共正式文件才将国内统战和外交相区分，并将其看作是中共“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外交工作的开始^[3]。”二战结束后，美苏开始对抗，“两个阵营”理论应运而生，中共很快接受了这一理论，并在革命外交的理念下确定了新中国“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外交战略。

纵观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外交理念与实践，可以发现其思维特点。第一，信奉阶级斗争理论，以非左即右、非敌即友的二分法来分析外交事物，难免带有强烈的革命色彩；第二，并未形成真正的外交观念，将外交更多地视作建立在阶级斗争理论基础上的对外统战工作，其实质是统战工作在海外的延伸。在此思维方式下，形成了一套相应的方法论，即按照阶级斗争思维将统战对象划分为“左、中、右”三派，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其重要思想是“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即“以斗争求团结^[3]。”这套方法也被用于新中国早期的外交之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对印外交观念及实践

中印虽同处于亚洲大陆板块之中，且互为陆上邻国，但喜马拉雅山脉这一天然屏障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印之间在中古时期的交流。在地缘环境的影响下，近代以前，中印之间虽有过一定的交流，但整体上的程度较低。随着二战结束以来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中印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

在革命外交理念的影响下，中国以立场来给周边国家定性，而印度政府起初并不为中共高层所认可。毛泽东认为，印度不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而是以和平移交权力的方式取得的，印度获得的仅仅是自治的地位，还不是真正的充分意义上的独立，而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资产阶级则是帝国主义的傀儡^[3]。但为了解决西藏和平解放这一首要议题，避免印度成为英美制华的工具，中印进行了多次谈判后，最终于1950年4月1日正式确立外交关系。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中印建交，带有“权宜之计”的色彩，体现了中国政府稳住“后方”以解决国内和国际问题的考量。内政方面，中印建交谈判主要解决的是“印度政府处理国民党政权遗留的问题，以及印度政府对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态度问题^[3]。”就西藏问题、边界问题迟迟未能达成一致。此时不提这一敏感话题，固然有出于时机不成熟的考虑，但也有先稳住印度，掌握主动权并积蓄力量解决西藏解放问题的长期考量；外交方面，受“继续革命论”的影响，毛泽东想将中国的革命经验推广到国际之中，帮助“兄弟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取得解放斗争胜利的问题^[4]。”并试图将中国打造为亚洲革命的中心^[4]。这就使得中国需要将更多地国际上担负“援助世界

各国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亚洲、澳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繁重的责任^[5]。”受此影响，中国在这段时期的周边观念和国内的统战观念十分相似，可视同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孤立）顽固势力”。中印关系也在这段时间“既斗争又团结”。建交后，印度对西藏和平解放的阻挠、对抗美援朝的指责以及印度对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等外交往来中都体现了这一观念。

中国周边观念的改变，以及中印关系的转机发生在1953年。在这一年，斯大林于3月5日逝世，苏联高层很快释出缓和国际局势的信息，希望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平共处”；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订，中国领土安全的直接威胁得到解除，国家的工作重心也逐步转移到经济恢复与建设上来，这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了一定的调整，开始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周边观也有了从强调革命向和平共处转向的趋势。

西藏虽在1951年和平解放，但印度政府在西藏仍继承并享有自英国殖民时期攫取的诸多利益，尼赫鲁在1953年9月致电周恩，以图通过谈判解决中印两国在西藏地方的有关问题。出于“进一步稳定西藏局势、突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政治孤立与经济封锁”的需要以及“解决边界问题所需的各种资料准备严重不足^[6]。”的制约，中国采取“暂缓现状”的态度，自1953年12月31日开始，到1954年4月29日，整个谈判耗时近5个月，最终，中印两国签《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在谈判过程中，周恩来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6]。”即初版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体现了“中国领导人为意识形态斗争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相处，找出既行得通的、同时能被广泛接受的办法”的尝试^[7]。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不仅顺应了周边各国要求缓和与和平的诉求，还使得中印关系步入了快车道。此后，中国积极参加了平息亚洲战争的日内瓦会议，在与印度的密切合作中成功促成了全面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日内瓦协议的签订；在尼赫鲁的力邀之下，中国成功出席第一届亚非会议，并促使了“和平相处并发展友好合作”十项原则的通过，极大地改善了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同时，政府高层进行了频繁互访，民间交流连续不断，最终形成了“印度——秦尼巴依巴依”的友好关系。

三、革命外交影响下中国周边观的实质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外交政策，从内容上看经历了从提倡阶级斗争的革命外交思想向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和平友好外交。但其实质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为革命是有惯性的，既会影响外交事务决策者的思维方式，也会影响外交决策真正的实施效果与连续性。在提到“一边倒”政策是，毛泽东指出：“积中国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8]。”而正是这“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强调阶级斗争与立场、讲求非敌即友二分法、崇尚不断革命论的革命经验，中共领导人形成了以革命思维处理外交事务的思维定势，加之在外交领域，“由于专门知识准备不充分，经验的缺乏，以及信息不充分和时间紧迫等因素”，领导人往往会“更多地依赖已有的思想和国内政治经验等，在自己的认知框架里制定政策^[8]。”因此，中共在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能够在一夕之间就彻底改变长期以来的“革命外交”思想，想必是不大现实的。

中共提出并在一段时期内实践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并且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但其实质上并未真正跳脱出“革命外交”的思维框架，因为实施和平外交的目的仍是为了“联络一批人”来同资本主义阵营作斗争，通过这种策略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利用中间地带国家与美国的分歧，打出和平的旗号，以“进一步分化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9]。”因此，中共的外交仍然是以革命为特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并非替代了“革命外交”，而是与后者相整合，“从而大致协调了支持亚洲革命和发展亚洲外交之间的内在矛盾^[10]。”这一思想在之后逐渐发展为“中间地带”思想，成为了中共处理对外事务的又一重要理论。在此理论影响下，中国的周边观仍是“以斗争求团结”，但方式发生了一定的转变，提倡和平与发展，对周边国家释放善意，以争取其支持，最终达到孤立美国帝国主义的目的。

结语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一套以阶级斗争思想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并将这套方式用于外交之中，形成了带有浓烈革命色彩的“革命外交”，切实影响了建国以后的周边观念与外交实践。这种斗争性的外交思想在中印两国的建交、互动、以及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动中，逐渐发展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其外交逻辑仍以“联合-斗争”的革命思维为主，与当今的外交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究其原因是革命强大的惯性与领

领导人处理外交问题时对于革命思维的路径依赖,这使得外交“和平”与“革命”看似矛盾的两,却在中共早期的外交语境中得到“统一”。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著.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7.
- [2] 力平,方铭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年谱 1898-1949[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3] 张敏秋主编. 中印关系研究 1947-2003[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4] 张长江.20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18.
- [5] 牛军著. 1949-1955 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 修订版[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6] 杨奎松.新中国的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J].史学月刊,2010,(02):62-74.
- [7] 牛军.重建“中间地带”——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1949—1955年)[J].国际政治研究,2012,33(02):61-80+8.
- [8] 汪谦干.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思想[J].安徽史学,2021,(03):26-36+117.
- [9] 陈兼.将“革命”与“非殖民化”相连接——中国对外政策中“万隆话语”的兴起与全球冷战的主体变奏[J].冷战国际史研究,2010,(01):1-48.
- [10] 章百家.新中国成长历程中外交观念的变迁——从革命的、民族的视角到发展的、全球的视野[J].冷战国际史研究,2017,(02):1-18+319-320.

Peripheral View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New China--Taking China-India Diplomatic Practice in the Early 1950s as an Example

Yang Zhe¹

¹*School of Ethnology and History,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1069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victory in the War of Liberat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gradually completed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a revolutionary party to a ruling party. Howe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ts own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diplomatic situation, for a long perio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new China had a strong revolutionary coloring, and formed the concept of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with “class struggle” as the main feature. This concept greatly influenced China'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China. This concept greatly influenced China's attitude and foreign policy towards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set the main tone of China's peripheral view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In the 1950s, due to domestic and foreign considerations, China and India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hich continued to warm up in the following decade, and went through a honeymoon period. This period of change in diplomatic relations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ssence of China's peripheral views under the concept of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Keywords: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Sino-Indian Relations; neighboring relations